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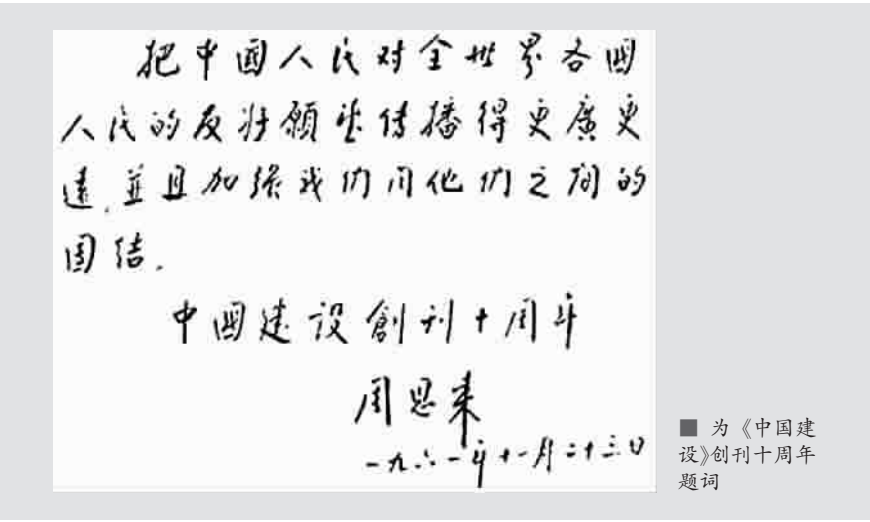
追忆相知深：周恩来手迹纪事三则(上)◆ 赵玉明

周恩来一生与上海有着浓厚的革命情缘。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多次到上海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活动:1926年12月,曾在上海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1928年,他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后,再次来到上海,领导创建中央特科,坚持白区地下斗争。1937年春,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事宜期间,曾多次到上海指导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领导在南京梅园新村的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驻沪办事处,对外称“周公馆”,并多次到上海与各界人士晤谈,推动和平民主进程,指导第二条战线的斗争。20多年间,周恩来十多次亲临上海,但由于革命工作繁重紧张,斗争环境复杂险恶,从目前看,那一时期,他并未在沪留下题词。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时间在北京,同时,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也多次到上海视察指导,这里有他的同志、战友、下属、朋友。本文提及的几幅,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在沪上所撰,或是为在申城的各界人士所题,体现了他对这座城市给予的密切关注和亲切关怀。

为中福会和《中国建设》题词

周恩来与宋庆龄的交谊深厚。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宋庆龄于1938年6月在香港领导建立保卫中国同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该同盟迁往上海,改名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5月,该会成立12周年前夕,周恩来特致电宋庆龄表示祝贺。同年8月,该会又改称中国福利会,主要从事妇幼保健、儿童文化教育以及对国外读者报道中国建设等工作。从1950年10月开始,周恩来先后三次到宋庆龄的北京寓所拜访,表示新中国已成



立一年,应当向全世界更多地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他们商议以宋庆龄与各国人民建立友谊的长期经历和丰富经验为基础,创办一本对外宣传刊物。宋庆龄完全同意,并认为这项未来规划“要绝对保密”。1951年中,在方中巷寓所,宋庆龄会见了刚从美国回国的陈翰笙、顾淑型夫妇,商谈办刊事宜,并且委托陈翰笙到上海联络金仲华,依靠中国福利会的力量筹办刊物。同时,宋庆龄邀请当时还在美国的爱泼斯坦、邱茉莉夫妇和耿丽淑尽快返回中国参加办刊。当时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爱泼斯坦等人排除阻力,绕道波兰等国,于6月到达北京,便立即投入刊物的筹办。1951年8月30日,在上海常熟路157号中国福利会会议室,宋庆龄主持了《中国建设》筹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金仲华、陈翰笙、顾淑型、爱泼斯坦、谭宁邦、吴耀宗、文幼章等,鲁平和林德彬也参加了会议,同时负责具体落实会议决定。宋庆

龄决定为杂志取名为 China Reconstructs,中文刊名《中国建设》。杂志初办时只有英文版,后来陆续增办了西班牙文版、法文版、阿拉伯文版、德文版和葡萄牙文版。当时在北京设编辑部,由陈翰笙与爱泼斯坦负责采稿、编辑;上海设业务部,由金仲华负责印刷、发行、推广。每出一期杂志,需要在北京与上海往返多次,很费时,经常出现脱期现象。后来,北京有了外文印刷厂。1953年5月,出版发行工作搬到了北京,但推广部门仍留在上海,直到1955年才全部搬到北京。曾任杂志副总编辑的鲁平回忆称: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杂志,多次对他们强调坚持“非官方”这个问题。他告诫工作人员,一定要明确——《中国建设》是孙夫人出版的杂志,不是官方喉舌,不要唱高调,杂志一定要符合宋庆龄的语言与风格。还要注意内外有别,区分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要有的放矢,考虑到

国外读者的接受程度。要坚持自己的风格与特色,也就是宋庆龄的风格与特色。1957年,为庆贺该刊创办5周年,周恩来题词,希望“继续作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第二年5月,适逢中国福利会成立20周年前夕,周恩来特地为该会题词表示庆贺。题词内容为“庆祝中国福利会二十周年纪念!祝中国福利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高潮中,响应党的关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号召,发扬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增进中国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和精神健康,为培养新的劳动一代,作出更大的贡献。”为了庆祝《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1962年1月,应宋庆龄邀请,周恩来、陈毅等与她一起赴位于北京百万庄的《中国建设》杂志社,慰问看望编辑部工作人员,鼓励大家为增进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把杂志办得更好。而早在1961年11月23日,为之题词:“把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传播得更广更远,并且加强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团结。”此题词的手迹在《中国建设》1962年1月号首次发表。

为斯特朗题词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她一生六次来到中国,每次都处于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刻:1925年,刚发生了省港大罢工;1927年,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1938年,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1940年,统一战线开始破裂时期;毛主席向她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她这第五次访问让她在中国乃至国际上名声大噪。此后,她离开延安到上海,后一度住在苏联。斯特朗的最后一次来华,让她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从1958年起,她定居中国北京,主持编辑英文版《中国通讯》,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文学的生命——我和我的作家朋友

修晓林

10.两易其稿

于是,我又再次半跪在你的面前,荒煤先生,将一双稍大半码的新鞋,轻轻地套在了你的脚上。当我仰起头再次看你时,见你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而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不太容易面带笑容的。你高兴地说:“我还要穿着这双旅游鞋登山、观海。”我又一次地感受到了你的善良、深沉又带有几分赞许的眼光。这时候,稍多的话语已经成了似无必要的陈述,暂时的静默反而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分手时,我看着我你在陪同人员的搀扶下,步履略显艰难地进入了那辆黑色轿车。当车尾的红灯渐渐隐没在都市的喧闹声中,我的心里也慢慢升腾起对一位文化老人的由衷祝福。回到上海不久,我就收到了你的来信。你说你腰疾复发,尚未能确诊是腰椎骨刺还是劳损,阵痛得坐卧不安。每天都要跑医院,还要参加难以推脱的会议,很疲劳。你还说你有个“坏毛病”——不记日记。因此一时想不起来近年哪月哪日发生的事可作“中国人一日”征文,但又与我讲定,“多蒙热情邀请,我当尽力写一篇”。六个月后以后,我欣喜地收到了你的《一件珍贵的礼物》,你还在附信中特别关照:“稿收到后,盼来信简告,以免挂念。”几天后,我又收到了你的修改稿,你说自己开始写此文时,恰好是1月21日——列宁逝世六十九周年的纪念日,有所触动,觉得对文章的结尾文字稍加改动,会更加合适些。如此,为了这篇三千余字的散文,你两易其稿并三次给我写信,这使我深切地感到,即使是一位著作甚丰、素负盛名的老作家,也是格外看重和珍惜自己的新作,让自己的每一篇文章,都成为深思熟虑的情感结晶和称道的精品佳作。在《一件珍贵的礼品》中,你写到自己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价值观”:一套光辉庄严的前苏联军服,连同八枚勋章,只等于一张卡



拉OK的门票!你还说写完这篇文章时,正是春节前夕,大年三十的深夜,窗外不断闪耀着五彩缤纷的烟火,这些都更加激起你无穷尽的思考。就是这一天,你这个多梦的人,多次梦见列宁,忽而是电影上异常活跃的列宁,忽而是你第一次真正看到的列宁——那是1951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到红场去瞻仰领袖遗体时,你看到了安详平静地躺着的列宁,你不禁热泪盈眶,你又似乎听到列宁严厉地问自己:苏联人民能够笑着与历史告别么?你又忽而听到列宁微笑着轻声问道: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这篇文章在1992年第2期《小说界》杂志发表后,受到好评,并获得“中国人一日”征文的特别奖。

从那以后,我仍然期望能与你再见面。那年夏末,听到了你病重住院的消息,心中不禁一惊。从此,我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你能早日摆脱病魔的缠绕,盼着你早些康复出院,能够看到我们周围更多的新事物、新变化——为了一位著名的文学和电影理论家,为了一位德高望重又深沉多思的前辈。当我想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大礼堂,静静地躺着永远闭上眼睛的你,我们的心中就会泛起阵阵痛楚。我永远也忘不了你的那双注视着我的眼睛,那不仅是一双阅尽人间沧桑、饱览世纪风云的睿智又明亮的眼睛,更是一双对年轻后代充满热忱希望和无限期待的眼睛。此刻,我是如此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位从动乱时代走进改革开放时代、普通又还不忘有些作为的文学编辑,只有继续好好地工作,做出引人注目的成绩,才能有勇气面对你曾经又将是久远地看着我的那双眼睛。你去世后,我才在读报时得知,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一个闪亮的名字——“荒煤”笔名的由来。你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了“荒煤”二字的来历和立意:取名荒煤,是与你的原名光美谐音,另一方面,也是意味着,一块荒野中的煤石,尚未发光,但最后终将燃烧起来。早年的你,自取了这一诗性十足的名字,怀抱新青年的梦想和激情,投入到中国的文艺事业洪流中,燃烧自己,照亮前程……

24.第一次在狱中相聚

邹韬奋在律师孙祖基的陪同下准时赶到法院,由于章乃器和史良未到庭,法庭宣布改为当夜12时开庭。他被押进法警室,和法警们聊起了天,大谈国难严重和救国会团结御侮的主张,法警们听得津津有味。时间在他身边不知不觉流去。时钟的滴嗒声敲打着章乃器的心,自己不可能隐名改姓,躲藏起来。如果不出庭,就要遭到通缉,变成逃犯,既不能公开行动,仍随时有被捕的可能。他无法再在病房里安坐下去,焦虑地背手踱步。紧张地思考,让他感到疲惫,和衣躺在病床上,有了一些睡意。他的妻子和张志让律师赶到了医院,胡子婴一进病房就愁容满脸地说:“我和银行里的几个朋友通了情况,蔡承新还去找了杜月笙,了解了一下蒋介石的态度,杜月笙不肯透底,看来躲不过了。”“孙夫人是怎么想的?”胡子婴喝了一口茶,“事情迫在眉睫,孙夫人也认为不能长此下去,同意我们的想法。躲过今日,躲不过明天。”章乃器跳下床,脱去病员服,换上西装大衣,果断地说:“走,上法院去。”三人赶到法院时时钟正敲了十二下,邹韬奋由法警押着离开休息室,去法庭接受审问,章乃器与他并肩走进阴暗的法庭。史良一直没有露面,有情报说她已离开上海去了苏常一带。28日,江苏省高等法院二分院颁发通缉令。后来她这样回忆道:“我是救国会负责组织工作的人,为了不使工作受到影响,只好暂时躲了起来,把组织工作交给其他同志。法院方面竟发出通缉令,画影图形,张贴在各交通要道。为了藐视他们。我故意在爱文义路巡捕房门前张贴着通缉令的墙壁前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之后,史良化装成农村妇女手抱一个小孩,租了一部汽车从上海开到苏州,主动投案,关押在苏州司前街女牢。那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后(12月30日)的事了。再度被捕后,法庭拒绝辩护律师关于保释的请求,六人分别于24日、27日两天移送

长河秋歌七君子



潘大明

韬奋等人一进警察局,就被引到沈钧儒等人关押的房间里去,在患难中相见,大家格外快慰,彼此诉说了一番经过的情形,又说了不少互相安慰的话语。其实,24日已转到警察局的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早在等待与章乃器他们的相会,他们从狱卒们的神情、交谈中知道另几位战友要移到此地关押在一起。他们希望战友们早些过来,案子归并一处,也许可以早一点解决。沈钧儒他们盼望着其他三人,并且商量如何安排女律师史良的铺位,好让她一到便可以休息。27日晚上6时许,沈钧儒等四人刚用完晚餐,狱中工友送来新出版的《华美晚报》,四人传阅着,议论报纸上的有关报道。王造时读着一条消息,愤然不平,“岂有此理,上海市府竟公然宣布我们的组织为非法团体,试图颠覆政府!”“什么非法团体,救国会是公开的。”李公朴坐在床边,吸着烟,“如果是非法团体,吴铁城为什么忙不迭地见我们?我们派代表赴首都请愿时,南京市长马俊超还接见了。”“还有更严重的嘞,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王造时操一口带着吉安音的官话,继续往下念。“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沈钧儒悠悠地说,“古往今来,屡见不鲜。别管这些,说些好笑的轻松一下。”沈钧儒收起了晚报。话语不多的沙千里插了一句:“这么多罪名,至少每人枪毙七次,七七四十九,要耗四十九颗子弹。”众人大笑:“太多了,留着一些子弹打东洋人吧!”正在说笑之间,户外传来警车戛然止住的刺耳声音。李公朴迅速跑到窗前:“嘿,他们来了!”“少了一个,史律师没来。”不一会,楼梯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邹韬奋推门进来笑嘻嘻地说:“这里比看守所好多了,初具规模。”“参观一下吧!”沈钧儒拉着乃器和邹韬奋的手,“这是会客的,屏风外的圆桌吃饭,小房间是你俩住的地方,两张小铁床。公朴、造时他们给你们备好的。”